

名人軼事

蔣星煜 著

名人較事

蒋星煜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该书是作者在多年的文化艺术工作中的随笔结集，其中有对往事故人的回忆、读书所得、旅游见闻、戏曲观感等。文章短小，内容丰富，资料充实，文笔晓畅，能给人以知识与启迪。

## 名 人 烟 事

蒋星煜 著

责任编辑 郑 荣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新予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 印张104千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ISBN7—5348—0010—2/I·9 定价1.00元

## 序

星煜同志要我为《名人轶事》写篇序言，我踌躇了一下，写点什么呢？继而一想，就写点我所认识的星煜同志其人吧。当然，这似乎有点文不对题，但对本书的读者如何了解本书的作者来说，也许有点参考作用。

我认识星煜同志比较晚，那是在“史无前例”的年月。我们都曾被“靠边”了，并被驱赶到工厂里强迫劳动。星煜同志是药品包装工，我当食堂炊事员。我是《解放日报》的工作人员。我深知星煜同志所以会被打成“牛鬼蛇神”，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曾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过两篇历史小说，一篇叫《李世民与魏征》，一篇叫《南包公海瑞》。星煜同志的冤枉之处在于，他都是奉报社编辑部之命，为了发扬当时“上面”要发扬的“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而写的。想不到“文革”风暴骤起，就大祸临头，两篇历史小说被认定为“影射”、“攻击”、“恶毒透顶”的大毒草，作者当然成了“道道地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为此挨批受斗，一折腾就是几年，到了工厂也还不放过。一次上面抓“阶级斗争新动向”，车间里就把星煜同志拉出来又批斗了一阵。“当时我真为他抱屈：他是在代《解放日报》受过呀！可是批斗完后，我看

到他还是悠闲自在地回家，若无其事，第二天上班依然面带笑容。我终于找机会接近他说上了两句无关痛痒的话，根本算不上安慰。我们就这样正式认识了。

那时，我只知道星煜同志是一位戏剧工作者，闲来喜欢写点戏评，也写点历史故事和历史小说，文笔活泼而生动，如此而已。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重返新闻岗位，星煜同志进了艺术研究所，我们的交往逐渐增多起来。我才知道星煜同志也是一位历史工作者，对明史极有研究。写点历史故事和历史小说，只是他的副产品。但即使是副产品，他也是勤奋从事的。短短几年，他先后出了《海瑞的故事》、《包拯的故事》、《历史故事新编》、《公主的镜子》四本小册子。这些历史故事和历史小说，往往以古为鉴，给读者启迪至深，用我们新闻工作的行话来说，可读性又很强，因此在青年读者中风行一时。《公主的镜子》再版时，我曾为之写过序，我说，星煜同志是抱着“把历史知识普及给人民”的责任感来写历史小说的。毫无疑问，他做的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再后一些日子，我进一步知道，星煜同志原来还是一位中国戏曲史的研究工作者，更是一位研究《西厢记》特别是明刊本《西厢记》的专门家。我起初只是偶而在一些学术性刊物或大学学报上看到他有这方面的论文发表，后来，他的戏曲史专著《中国戏曲史钩沉》和《中国戏曲史探微》相继出版了，他的《西厢记》研究专著《明刊本西厢记研究》也送

到了我的案头，接着，他的《西厢记罕见版本考》又在日本东京出版。这不能不使我对星煜同志平添了许多敬意。原来他不是一般地弄弄笔头的人，而是认真严肃地在做他的学问的。尽管我对中国戏曲史的知识十分贫乏，对《西厢记》的版本更是一窍不通，可是，我深知做这样的学问，是来不得半点虚假和飘浮的。好在一些老专家们对星煜同志的这些专著自有其中肯的评价。如赵景深先生，就对星煜同志的研究成果相当推崇，说他行文运用史料“真是俯拾即是”，“有左右逢源之乐”，并嘉许他对《西厢记》明刊本的研究大大超过了郑振铎先生。马少波先生说他的《钩沉》《探微》有许多“发人之所未发，道人之所未道”，“能够钻进去，转出来，身入宝山有所得，以正确的观点鞭辟入里”。日本的波多野太郎教授，则认为星煜同志的《西厢记》版本研究，在方法上，是“对文艺学和文献学联系起来研究”，并说他“考究新颖”，“考核精细”，是值得伸出大拇指说“真可佩服，可佩服”的。所有这一些，我相信都决不是老专家们在瞎捧场，而是说，星煜同志在治学上确实取得了并不简单的令人可佩的成就。

由此，我对星煜同志的认识就大大地深化了一层。从这时我才恍然悟到，星煜同志平时看上去固然不求闻达，淡泊自甘，平易近人，但治学上却有着执着而顽强的追求，而且肯于付出极其艰辛的劳动。他长时期来几乎是争分夺秒，博览群书，打下了深厚的知识基础。他研究《西厢记》及其版本已达三十年之久，但有所发现，有所写作，一直秘不示人，

直到近几年才脱颖而出，为学术界所瞩目。十年动乱期间的日子是并不好过的。可是他白天挨批，晚上照样伏案读写，从不让宝贵的光阴白白地流逝。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名人轶事》，则是星煜同志另一种拿手作品——散文、笔记文一类了，其中包括读书小札、看戏杂感、人物通讯和游记等都有。这类作品我倒是比较熟悉的，当它散见在全国各种报刊上时，我多半读过。这次结集出版，似乎已是继《以戏代药》、《古今名人趣话》之后的第三本了。

星煜同志的散文、笔记文，我认为也是有其特点的。首先，由于他有渊博的知识，特别是中国历史、戏曲和古典文学的知识，所以他的散文、笔记文，富于知识性。无论写一个人，讲一本戏，或是参观游览一处地方，他都能写出一些“博古通今”的知识来，让你读了有所得，在知识上有所长进。第二，他的行文既活泼又自然，真所谓“信手拈来，皆成文章”，没有一点矫揉做作。不信，请读一下本书所收的《共赏玉茗花》、《程十发和他的画》等佳作。要不是功底厚实，运用文字是很难做到如此自然和流畅的。再一个特点是，有点风趣，有点幽默。我认为这有点文如其人。星煜同志所以能熬过十年浩劫，而终于没有“触及灵魂”，反而在学术上有所积累，有所收获，看来颇得力于有那么一点幽默感的支撑。他戏看多了，所以当那场所谓的“革命”降临大地时，他也是把它当作一出闹剧、丑剧、悲剧看的，不过自己从观众的地位一跃而成了“演员”罢了。他把这自嘲为“以戏代

药”，据说得自明代沪上名医秦景明的“真传”。写到这里，我确实很赞赏波多野太郎教授对星煜同志的评价。星煜同志是一位学者、专家。如果不是学有专长，他是写不出那么富有知识性的散文、笔记文的。但是，他又不是“呆若木鸡式的书斋学者”，更不是“道貌岸然的经院式学者”，所以他的散文、笔记文，又写得那么清新、活跃而饶有趣味。

我想要说的就是这一些。归结起来是两句话：我乐于向读者介绍星煜同志其人，我也乐于向读者推荐其书。

陈念云

1987年元月

## 目 录

序	陈念云	(1)
关羽和秦宜禄的妻子		(1)
关公戏的神化与人化		(5)
刘关张每碗五分		(9)
《长恨歌》、《梧桐雨》、《长生殿》中的杨贵妃		(11)
古典戏典中的杜甫		(17)
萧太后的政绩与军功		(20)
岳飞、道悦、大鹏金翅鸟		(22)
魏良辅寄寓的“娄东”在何处		(27)
《高文襄公全集》与海瑞罢官事件		(29)
海瑞的佚诗佚联		(38)
海瑞书法的流传与鉴别		(42)
张居正关于海瑞的几封信		(47)
汤显祖、杨潮观、芝麻		(51)
《太白剑》及其作者姚康		(53)
方文的《六声猿》及其他		(57)
用诗歌写戏曲评论的金德瑛		(62)
蒋士铨与雪莱		(64)
赵翼对秦桧的美化和辩解		(66)

《全清散曲》是通俗文学的宝库	(70)
涉猎宗谱一得	(73)
鲁迅先生所说的“目连瞎头”	(76)
张若谷和《马相伯年谱》	(78)
郑振铎与上海的书林	(80)
关于顾仲彝教授	(83)
梅兰芳、周信芳主考记	(87)
和周信芳一起挨斗的日子	(90)
赵景深教授二三事	(93)
俞振飞和《太白醉写》	(101)
我的“棚友”黄佐临	(106)
傅全香对古典文学的热爱	(110)
程十发和他的画	(113)
波多野太郎和《中国传统音乐集成》	(119)
上海，昆剧的沃土	(122)
回到中国的《镜狮子》	(126)
川剧的魅力	(128)
我与《海瑞上疏》	(131)
《李世民与魏征》事件始末	(135)
共赏《玉茗花》	(141)
普救寺之旅	(146)
后记	(149)

## 关羽和秦宜禄的妻子

建国初期，我曾在《新民晚报》写了一篇《斩貂蝉考证》，后来收进了《中国戏曲史钩沉》一书，附带谈了裴松之引《蜀记》注《三国志》的问题。

关羽斩貂蝉一事全系元代戏曲家所虚构，貂蝉这个人物也是虚构的。其虚构的素材有三，其一是《三国志·吕布传》，其二是《三国志·董卓传》，把这两篇传记中董卓的侍婢与少妻合为一人，其三就是我所提到的裴松之所引的《蜀记》这一段记载：

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

元代戏曲家小说家所塑造的貂蝉包含了秦宜禄妻子的成分原无可怀疑。他们之所以想把关羽和貂蝉组织到一个故事中并使之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主要为了加强戏剧性，在思想上则以此而着力渲染关羽的不爱女色。恐怕也受到了《蜀记》这条记载的启发。

1983年，孔石雨同志在《艺谭》第三期发表《漫谈关羽》一文，对关羽的“义”与“勇”作了深刻的批判，当然可以

成立，但是他为了全盘否定关羽，也在这一节引文上加以引伸和发挥，并根据他自己的意图，说成是：

偶一翻检《三国志》，在裴松之注中看见一条记载：曹操破秦朗之父，俘得秦朗之母，甚为美人，关羽请求曹氏，要这个美人为妻妾。曹操一看之后，没有同意而自纳之。

我认为原文应该解释成为：吕布在围城之中，派了秦宜禄出来，向曹操刘备他们求降。而秦宜禄妻子家小还在城内，他想先接出来，关羽向曹操转达了这一请求，曹操也同意了。下邳城将被攻破之前，秦宜禄又谈起这件事，曹操是多疑的人，他怀疑此人可能是绝色女子，先找来看看，果然为他所料，就留下来作自己的侍妾了。事情发展成这种样子，关羽当然一直感到心中不安。

曹操把秦宜禄的妻子弄去以后怎样呢？还是有下文的。刘孝标注为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作注时，在《夙惠第十二》的《何晏》条下，引了《魏略》：

晏父蚤亡，太祖为司空时纳晏母。其时秦宜禄阿骡亦随母在宫，并宠如子。常谓晏为假子也。

这说明关羽在当时也不是当事人，所以后面也从未介入。果真关羽和曹操为了秦宜禄的妻子而争风吃醋，他们后来彼此的相处一定会严峻而困难得多。史学家不可能忽略，戏曲家小说家又要大做文章了。至于封金挂印、灞桥挑袍之类的情节，即使虚构也无法虚构了。

现在认为《蜀记》的记载足以证明关羽为好色之徒者不

乏其人；他们主张作如下标点：

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  
把“娶”字径作为“娶妻”解。而且是关羽要求“乞娶其妻”的。

我则标点成为：

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  
把“娶”字作“取”解，提此要求者为秦宜禄。

按关羽一生名节，固曾威震华夏，但骄气凌人，大意失荆州，是为蜀汉罪人。但《三国志》确未有一字提及关羽之好色。陈寿在《三国志》中对蜀汉诸人之尺度原过于严厉，对诸葛亮亦不无微辞，如关羽有此瑕疵，陈寿断不会手下留情也。

在戎马仓皇之际，如果关羽一再要求与敌人或俘虏的家属成婚，则完全不可理解，因为关羽从来没有这种卑劣的表现。

现存元人杂剧《单刀会》、《斩貂蝉》、《西蜀梦》、《千里独行》、传奇《古城记》、《草庐记》对关羽的形象的塑造虽有夸张或虚构之处，但其道德节操则基本与《三国志·关羽传》相一致。

有同志引了《三国志·明帝纪》的注文，证明仍有可能是关羽要求曹操准许他自己娶秦宜禄的妻子。我想，作为“可能”，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

刘孔伏、潘良炽同志在一篇文章中说：

关羽未能娶秦宜禄的妻子，深感有负朋友重托，  
“心不自安”。

这完全违反了逻辑，如果关羽和秦宜禄的妻子成婚了，倒反就对得起秦宜禄了么？真是“此话从何说起啊！”果真要谈是否“有负朋友重托”，那末“娶”仍应作“取”解。

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才能解释得通。那就是秦宜禄知道自己的妻子已经无法保住了，不入曹操之手，则入关羽之手，他在曹关两人之间作了选择，决定从关拒曹，结果未能如愿。但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存在的，在任何一种社会里也不会发生的，更何况在封建社会中呢？

因此，我觉得未有充分论据之前，且慢为关羽加上“好色”的罪名。

## 关公戏的神化与人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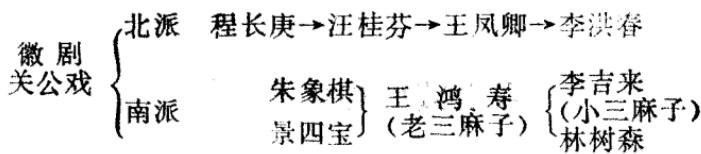
在元明清三代，统治阶级都曾大力美化关羽，封帝称圣，层出不穷。因此关公戏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在内容上则使其人其事不断升级以接近神圣的地步。

清朝初年，统治阶级就有计划地开始抬高关羽以淡化群众对岳飞的崇拜。清太宗皇太极于崇德四年（1639）命大学士达海翻译《三国演义》等书为满文，以供满族将校阅读。乾隆年间，在“十大武功”前后，同时也注意到了如何利用三国戏配合政治活动、军事活动的问题，编写了以三国为题材的系列长剧，名曰《鼎峙春秋》。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人物，便是关羽。

发展到后来，即使并非三国时代的戏，也尽可能地对关羽大加歌颂，甚至加以神化，例如《南阳关》，就属这一类。故事写隋代的宇文成都把伍云召杀得大败，伍落荒而走，宇文成都紧追不舍，有一个叫朱灿的出来抱不平，到关帝庙中拿了一把大刀，假扮成周仓的样子，就将宇文成都吓跑了。而周仓不过是替关羽捧大刀的裨将，居然也有此威风，可见神化关羽到了什么地步。

我这里举京剧的关公戏为例，谈一谈三百年来流传的主要

要情况，以及怎样从“神化”又逐步回复到“人化”的。先立一简表如下：



程长庚最初没没无闻，到戏班毛遂自荐。老板漫不经心地问他能唱什么戏？他因为最擅长关公戏，所以便回答：“关公戏都能唱唱。”后来让他唱《战长沙》，果然嗓音高亢洪亮，气概英勇不凡，从此成名，而被视为关公戏的正宗了。王庆班入京，程长庚的关公戏又成为他的代表作，经常献演，戏目则以唱《战长沙》与《华容道》时较多。这两出戏都以歌颂关公的“义气”为主，唱工发挥得淋漓尽致，开打则极少，关公相当儒将化，在所有武将中，显得十分特殊。

汪桂芬是程长庚的琴师出身，后来也粉墨登场，技艺不逊乃师。唱工尤见用力之深，白口与做工则稍稍差一些。他演《战长沙》，由谭鑫培饰黄忠，当时视之一绝。王凤卿受汪桂芬传授，所演关公戏亦以《战长沙》、《华容道》为主。

从程长庚到王凤卿，他们的关公戏是一脉相承的，在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看不出有多大变化。这三个人都曾在清宫内廷演出关公戏，当关公出场时，无论那个皇帝，或是慈禧太后，都起立致敬的。直到李洪春，才在做工方面下更多功夫而与唱工并重，人情味略有强化，而“神”的成分开始有所冲淡。

王鸿寿原是徽剧出身，到上海以后，经常演出《华容道》、

《白马坡》、《战长沙》、《古城会》、《过五关》、《水淹七军》，以关公战败身亡为题材的《走麦城》也是他的拿手戏。他的关公造型威武庄严，有极高评价，被称为活关公。

本来《走麦城》一戏，戏院、艺人均不敢问津，怕得罪关公而降灾难，诸如失火、雷轰等等，王鸿寿照演不误，始终平安无事，为剧坛破除了迷信。从此以后，北方各大城市皆演《走麦城》了。

得王鸿寿嫡传者为李吉来，因王鸿寿艺名老三麻子，他对李吉来颇为赏识，为之取了小三麻子的艺名，亲授《灞桥挑袍》、《古城会》、《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等剧，李吉来恪守师教，全盘继承，自然很不容易。王鸿寿另一传人林树森在继承中作了某些改革和发展，他是第一个在关公戏中突出武打的。原来所有京剧中的武戏，无人不打八件，岳飞在《请宋灵》一剧中照打八件不误。传统戏中，因为关公是略读《春秋》而能上口的儒将，所以白口唱词都较深奥。例如《赠袍赐马》，关公原来白口为：

某非俭也，旧袍为我兄所赐，穿之如见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袍而忘兄长之旧赐也。

林树森翻成了白话文：

想这新袍乃丞相送与我的，穿了这件旧袍，如同见了我大哥一样。关某不能有了新的，就把旧的忘了。凡此种种，实际上都是把已经神化了的关公再人化回来。

附带要介绍一下赵如泉，他在清末民初时期，也是著名的关公扮演者之一。但他不是直接继承王鸿寿的，他当然也